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 与基层人大选举*

刘欣朱妍

提要:与强调用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层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该理论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关键词:社会阶层 收入 阶层认同 基层人大选举 投票行为

已有的关于中国民众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行为的研究,主要根据人们的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对国家政权的认同等主观因素来解释其投票行为差异(Shi, 1999; Chen & Zhong, 2002);而人们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似乎被忽视了。

经典政治社会学把阶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置于核心地位,并通过阶层成员的共同利益、阶层认同等来阐明阶层地位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Lipset et al., 1954; 李普塞特, 1995, 1997; Campbell et al.,

*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08JZD0024)、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08)的资助。本文主要内容曾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2010年11月6-7日,上海)、“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25-26日,北京)、中国社会学会2011学术年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论坛”(2011年7月23-24日,南昌)等研讨会上报告。作者感谢陈志柔、Deborah Davis、黄荣贵、李路路、李春玲、李煜、张力以及本刊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或评论。文责由作者自负。

1960; Manza et al. ,1995)。而新政治社会学则持反阶层政治论的观点,强调阶层政治在后工业社会中因劳工阶层的贵族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而式微,甚至不复存在(Offe, 1985; Whiteley, 1986; Manza et al. ,1995; Inglehart, 1997)。我们认为,对于处于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社会而言,反阶层政治论或阶层政治终结论者所指出的导致阶层政治式微的原因并不符合现实。

在30余年的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均等化(Parish, 1984)向阶层化的转变(李培林编,1995;陆学艺主编,2002,2010;李强,2009)。公有产权制度的改革、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化和扩张、户籍制度、劳动身份制度的变化导致了阶层结构的转型(刘欣,2010b);社会大转变(Burawoy, 2000)正塑造着新的阶级阶层结构和不平等(沈原,2007);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吴敬琏,2009),社会上下层之间有两极分化乃至断裂的趋势(孙立平,2003)。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劳资矛盾突出的“政治经济学时代”(卢周来,2005;吴敬琏,2009)。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源于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刘欣,2009)。一些研究也显示,中国不同阶层间在阶层意识、社会态度、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上,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刘欣,2002;李培林等,2005;张翼,2008;Cai, 2005; Chen & Lu, 2006; Li, 2006; 李春玲,2011)。

本文试图循着阶层政治论的基本思路,以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为主要依据,考察不同阶层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形成的机制。

一、阶层与投票行为

政治社会学对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中产阶级与劳工阶层在投票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别这一议题展开的(Evans, 1993; Manza et al. ,1995)。^①已有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中产阶级在选举中倾向于支持右派政党,而劳工阶层则倾向于支持左派政党。对社会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

^① 由于抽样调查中所能抽到的社会上层的样本量总是很小,因此,研究者常把上层抛开,着重考察中产阶级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差异(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存在这种稳定联系的机制,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Manza et al., 1995)。

理性选择的解释认为,不同阶层成员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Eulau, 1955; Lipset et al., 1954; 李普塞特, 1995, 1997)。劳工阶层居于被支配的阶层地位,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选举中会倾向于支持左派政党(强调国家干预);小资产者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由市场的存在,在选举中会倾向于支持右派政党(强调自由放任);白领中产阶层虽与劳工阶层同样处于受雇的地位,但较劳工阶层有着更大的管理支配权,也有着更稳定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因此较劳工阶层趋于保守而支持右派政党(Heath et al., 1985; Heath et al., 2003; Bartle, 1998)。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解释(Franklin & Mughan, 1978; Weakliem & Heath, 1994; Van der Waal et al., 2007)。然而,一些研究者也发现,中产阶层有一定比例的人会投票给左翼民主政党,而劳工阶层也有一定比例的人会支持右翼保守政党(Achterberg & Houtman, 2006; Whiteley, 1986)。

强调阶层意识重要性的社会心理解释(Campbell et al., 1960)试图阐明为什么部分选民的投票倾向与其客观阶层地位不一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选民的客观阶层地位是否会影响选举行为要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具备了这些条件,阶层地位才起作用。而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阶层归属时,选民的客观阶层属性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

上述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机制虽不相同,但都属阶层政治论的范畴,强调阶层地位对政治行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阶层政治论者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观点。他们认为,阶层与党派倾向、投票行为之间的联系正在削弱,阶层政治有“解盟”(de-alignment)趋势;甚至断言阶层不再是理解和预测选民行为的工具(Clark et al., 2001)。而阶层政治式微,是由后工业社会劳工阶层的贵族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所导致的(Offe, 1985; Whiteley, 1986; Manza et al., 1995; Inglehart, 1997)。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政治态度、投票行为与其客观阶层地位并不一致:部分工人将选票投给了保守党派,而中产阶层的部分成员也在选举中加入了左派阵营(Achterberg & Houtman, 2006; Whiteley, 1986)。他们认为,一些“非阶层的”因素,比如地区间差异(Johnston & Pattie, 1992)、选民的个性特质(Denny & Doyle, 2008; Whiteley, 1986)、民众的政治知识和素养(Heath & Tilley,

2003; Inglehart, 1997) 等 对投票行为的差异更具解释力。

学界关于是否出现了阶层政治消解的争论仍在进行中。针对反阶层政治论者的挑战, 阶层政治论的捍卫者认为, 他们对阶层的分类和阶层投票率的测量都过于粗糙, 因而, 其阶层政治式微的错误判断是由这种粗糙的分类和方法所导致的(Evans, 1993; Prandy, 2000; Manza et al., 1995)。使用更有效的方法, 所得结论则截然不同(Franklin & Mughan, 1978; Weakliem & Heath, 1994; Van der Waal et al., 2007)。因此, 阶层政治不但依然有效, 而且, 那些被看作非阶层因素的解释也完全可以置于阶层分析的框架内做出阐明(Weeden 2002)。

对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 前述反阶层政治论所断言的阶层政治式微的主要原因是 不切合现实的(Szelenyi et al., 1996, 199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 劳工阶层的队伍还在扩大(陆学艺, 2010; 陆学艺主编, 2010; 李强, 2009), 中产阶层的队伍依然较小(刘欣、马磊, 2011), 还谈不上工人阶层的 中产化、贵族化。市场机制的刺激激发了人们一夜致富的心态, 个人利益追求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目标(王俊秀、杨宜音主编, 2011), 而不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吴敬琏, 2009)、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陆学艺主编, 2010; 李强, 2009), 以及私有产权的合法化使劳资关系成了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蔡禾等, 2009; 吴忠民, 2006; 于建嵘, 2007)。中国正在由改革前的均等化社会转向一个阶层化社会。在这样的情境下分析人们的政治行为, 是不能对阶层分化的现实视若无睹的。因此, 我们在本文中 将检验阶层政治论的适用性并拓展其解释思路。

二、中国城市的阶层划分

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 学者们提出或引介了不同的方法(比如, 陆学艺主编, 2002; 李培林、张翼, 2008; 李强, 2010; 李路路、李升, 2007; 刘欣, 2007, 2010a; 李春玲, 2009; 林宗弘、吴晓刚, 2010)。这里采用刘欣(2007, 2010b) 的阶层分析框架, 因其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了公共权力在阶层分化中的作用。

刘欣(2005a, 2007, 2010b) 认为, 在当前中国社会, 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社会成员因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

的差异而分化为有权与无权、有产与劳工两对基本阶层;而地位居于这两个基本阶层之间的是中产阶层。在中国城市社会里,“社会上层”由在公共权力、公有资产控制权或者私有资产所有权/控制权的权威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人员构成,包括党政事业机构的高级领导人员、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民营企业等。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工人阶层主要由“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构成,他们是城市社会的草根阶层。中产阶层居于社会上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包括新、老两类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由小业主和自雇者构成。新中产阶层又据所享有的公共权力、市场能力的相对量,划分为“新中产上层”和“新中产下层”。前者包括党政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中等规模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民营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后者则包括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国有(控股)企业的基层管理者、民营企业的低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的经理等。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基本分析框架,它由六个阶层构成:社会上层、新中产上层、新中产下层、小业主及个体劳动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刘欣 2007 2010b)。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产阶层地位因依赖于权力和市场而可能存在的内部异质性,^①我们按照新中产阶层的成员在公共权力结构和市场能力结构中的位置对他们作了重新分类。“公职新中产”由公共权力的赋予而确定其阶层地位,主要包括上述新中产阶层成员中的党政事业单位的中低层干部、国有(控股)企业的中低层经理和管理人员。“市场新中产”由市场能力确定其阶层地位,主要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民营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由于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很少,我们在有关分析中将其合并到新中产阶层之中。

三、中国城市基层人大选举中的投票行为

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始于195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乡镇

^① 学界对中国中产阶层异质性的研究尚不多见。李路路、李升(2007)对中产阶层的异质性做了新的类型化分析,他们依据中产阶层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关联,将其分为“内源性中产阶层”和“外生性中产阶层”,并考察了二者在代际地位传递、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的整体差异。

人大选举共进行了6次。“文革”期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常运作受到重创。1979年后,基层人大选举逐渐恢复。^①目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以上的人大代表则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本文所关注的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②

在任何形式的现代代议制下,选举都是连接公民与国家政权的纽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权力获得合法化的过程。然而,中国的人大选举与西方的竞争性政党选举却有所不同。

一方面,参与竞选的候选人的不同使得参选行为具有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民主选举是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完全竞争性的选举;选民的投票行为是对不同党派候选人提出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所做出的选择(何俊志,2009)。而政党往往代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因此,不同阶层的选民在选举中会与不同的政党结盟,形成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左—右”分野(李普塞特,1997)。目前中国的人大选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在基层选举中,允许采取差额选举、选民提名候选人、代表候选人进行竞选宣传等活动,基层人大选举的透明性有所增加,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Li, 2002; Womack, 1982; 蔡定剑主编,2002; 何俊志,2005; 史卫民、雷兢璇,1999)。有相当比例的代表候选人是由“选民提名”(10人以上联合提名)而产生的(刘智等,2001; 史卫民、刘智,2003);在不少选区,由“组织提名”(党组织、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比例已降到了20%以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主要是由选民提名产生的。因为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普遍存在着人为减少“组织提名”候选人人数的情况:如只将乡镇党委提名的候选人作为“组织提名”的候选人,而村级党政组织、团组织、妇联等提名的候选人均作为“选民提名”;将“组织提名”作为“选民提名”的补漏,先发动选民提名候选人,当所提候选人与组织已物色好的候选人吻合时,组织便不再提名,而对已物色好却没被选民提名的,则以“组织提名”补漏的方式提出;由党政组织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时通过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此后,于1982、1986、1995、2010年4次修改《选举法》。

② 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乡级包括乡、民族乡和镇。

的成员联合 10 名及以上选民提出代表候选人,变“组织提名”为“选民提名”(史卫民、刘智 2003)。这种候选人产生的方式降低了选举的竞争性,但却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在掌控之中。在这种非完全竞争性选举的情形下,选民则会因无法通过自由推选不同的候选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转而采取参选或不参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Shi,1999; Chen & Zhong 2002)。

另一方面,西方代议制的民主选举是使执政党在与其它党派的竞争中通过自下而上的选民意愿表达来获得执政权合法性的过程。而中国的人大选举则是国家政权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合法化的(阿尔蒙德等 2010; 海贝勒 2005)。尽管在西方的选举中也有不同政党自上而下的选举动员甚至民意操纵,但因选举是高度竞争性的,选民仍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来自下而上地表达选择意愿。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形下,选举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自上而下贯彻执政者权力意志的政治仪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如果群众对选举活动参与不积极,就会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不满或敌对(马尼恩 2010; 吴继平 2006)。改革开放后,国家虽不再以近乎命令的方式要求民众参加这种政治仪式,然而,为了得到符合期望的参与率和投票结果,选举仍是高度受控和受引导的(蔡定剑主编 2002; 马尼恩 2010; 史卫民、刘智 2003)。有关研究发现,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当选的情况极少发生,不超过 1%(刘智等 2001; 史卫民、刘智 2003)。同时,一次选举成功的选区比例在各地都高于 97%; 而因所确定的候选人得票率过低、选民参选率过低等所导致的再次投票、另行选举和无效选举的情况,在全部选区中所占比例不超过 3%(刘智等 2001; 史卫民等 2009)。从形式上看,在选举中参选者投反对票或将选票投给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投票者对已确定名单中的候选人投的是赞成票。

因此,在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民众与国家权力意志相一致的体现; 而“没参加投票”所衡量的则可能是民众与国家政权意志一定程度的疏离。

四、研究假设

结合阶层政治论者的理论阐述、我们对阶层地位的定义和对投票

行为的理解,不难得到一些关于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设。

(一) 中产阶层积极假设

根据阶层政治论的理性选择解释,人们在选举中的行为取决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权衡。在当前中国社会里,一方面,人们的阶层地位取决于其在公共权力结构和市场能力结构中的位置,新老中产阶级、工人阶层因其所处阶层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参加投票与否,体现了公众对现有权威结构的支持与否。因此,在城市基层人大选举中,那些受益于现行权威结构的阶层成员,更有可能在选举中参加投票,以便通过支持现有权威结构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之,那些利益受损阶层的成员则更可能质疑现行权威结构的合法性,而以不参加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是在政府主导的市场转型过程中成长发育的,是改革过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工人阶层则因国企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改革,其“主人翁”地位的感受已成昔日记忆(孙立平,2002;孙立平等,2004;陆学艺主编,2002,2010)。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1a: 中产阶级比工人阶层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更有可能参加投票。

由于阶层受益可以用收入来衡量,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

假设 1b: 收入变量的引入可以削减中产阶级对投票行为的效应。

(二) 中产阶层异质性假设

公职新中产由公共权力确定其阶层地位,而市场新中产由市场能力确定其阶层地位。前者的利益更依赖于既有的政治权威,而后者的利益更多地依赖于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2a: 公职新中产比市场新中产更倾向于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

小业主和自雇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基于有限私有资本量的市场能力的实现,以私有产权完整且不受政府等外在权力的干预为前提。但由于中国的市场是在政治体制连续、政府主导的改革中发育成长的,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刘欣,2005b),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准入、银行贷款、土地和劳动力使用等方面,都受到各级行政和执法机

关,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的直接规制或干预,这些干预甚至为一些不法管理者提供了寻租机会(刘欣 2005b)。因此,挣脱既有权威结构的不合理管制,获得充分的市场自由是小业主和自雇者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实现最大化利益的条件。缘此,我们提出:

假设 2b: 新中产阶层比小业主和自雇者更有可能在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

(三) 阶层认同假设

只有当人们对自身的阶层地位有清晰的认识,意识到自己的阶层归属时,选民的客观阶层属性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Campbell et al., 1960)。人们因具有共同的客观阶层地位而形成主观阶层地位认同,进而具有相同的投票行为(Campbell et al., 1960)。因此有:

假设 3: 阶层认同变量的引入可以削减客观阶层地位对投票行为的效应。

五、资料、变量与统计模型

(一) 资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城市样本资料,样本量为 5205 份。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开展。调查采用了四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从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抽取 125 个县(区)、500 个街道(乡镇)、1000 个居(村)委会、10000 个家庭。对选中的家庭,采用 KISH 随机抽样表从 18-70 岁的成员中选取一位进行访问。剔除未经历过最近一次人大直选、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可为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量为 4914 份,占城市总样本量的 94.41%。

(二) 变量

1. 因变量

CGSS2006 城市问卷询问了被访人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选中有没有参加投票。我们以此为因变量,并构造一个二分虚拟变量, $I =$

“参加投票” ρ = “没参加投票”。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阶层地位,收入和阶层认同为中间变量。

对阶层地位,我们参照刘欣(2007, 2010b)的中国城市阶层分析框架,根据CGSS2006中的职业、管理职位、行政级别、雇佣状况,划分出17个阶层位置并将其归入4个阶层类型:(1)“公职新中产阶级”,包括党政事业单位的处级及科级干部、国有(控股)企业科股级经理和管理人员、公有部门的职员办事人员,以及从社会上层中合并过来的少量党政事业机构副局级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副处级(或相当)及以上的管理人员;(2)“市场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民营企业的经理及管理人员、职员办事人员,以及少量雇佣10人及以上的私营企业主;(3)小业主和自雇者,包括雇佣0-9人的私营经济的所有者或自雇劳动者,即老式中产阶级;(4)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在统计分析时,将4个阶层类型编码为4个虚拟变量,以工人为参照。

收入指2005年受访者全年的个人总收入,以千元为单位,并对其取自然对数。在分析资料时发现,样本中有378位受访人的收入为缺失值。我们据被访人所在的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级别、阶层地位,对样本分类计算了各类别的个人年收入均值,并用这些均值替代了相应类别中样本的缺失值。由于一些样本所报告的收入为0,在进行对数运算时我们给收入加上了一个小数0.0001(千元)。

CGSS2006调查有两组问题涉及阶层认同。一组问题询问了被访人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这五个阶层中的哪个层次,另一组询问的是被访人认为自己属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中的哪个类型。我们以第二组问题来测量被访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我们把认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合并为认同劳工阶层;由于认同企业家阶级的人数很少,只占0.8%,将其并入认同中产阶级。这样能更明确地测量劳工阶层与中产阶级认同的差异。被访人在回答第二组问题时,有487(9.9%)人没作选择,但他们却大都在五分类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上做了选择,因此,我们据其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把认同中层及以上的被访者归为认同中产阶级,而认同中下层、下层的归入认同劳工阶层。在统计分析时,将阶层地位认同编码为虚拟变量,以认同劳工阶层为参照。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人所居住的城市级别、工作单位的所有制、被访人的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为中共党员。

我们将被访人所在城市分成4个级别,即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其他副省级市和地区级城市、县城和县级市、集镇。在统计分析中,转换为4个虚拟变量并以集镇为参照。

我们将单位所有制类型和党员身份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些因素在选举中有可能影响到选民被动员的程度。公有制单位在联系国家与民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有部门的员工被动员参与选举的可能性要大于非公有部门。单位所有制分为两类,公有制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包括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与其他类型。在统计分析时,编码为虚拟变量,以非公有为参照。

性别虚拟变量以女性为参照。

年龄以岁数计,由于年龄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常常不是单调线性的,因而加入了二次项。

党员身份在选举中既衡量了政治忠诚,又约束了其投票行为。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党员比非党员更有可能参加投票(海贝勒,2005;田毅鹏,2007)。在统计分析时,编码为虚拟变量,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

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 统计模型

我们采用二分逻辑斯蒂(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来考察人们的投票行为。方程如下: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alpha + \beta X + \gamma C + \varepsilon_i$$

其中 p_i 为参加投票的几率, $1-p_i$ 为没参加投票的几率; X 是自变量矩阵,包括3个阶层虚拟变量、收入和阶层认同虚拟变量; C 是控制变量矩阵,包括3个所在城市级别虚拟变量、单位所有制虚拟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年龄、年龄平方项,以及党员身份虚拟变量; α 是截距; β 、 γ 是回归系数向量,衡量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 ε_i 为残差项。

变换上述公式,可得所估计的参加投票与没参加投票的几率比(odds ratio)为:

$$\frac{P_i}{1 - P_i} = e^{(\alpha + \beta X + \gamma C)}$$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频数	%	变量	频数	%
所在城市级别			阶层		
直辖市/省会城市	2160	43.8	公职新中产	973	19.7
地区市	1224	24.8	市场新中产	1097	22.2
县城及县级市	705	14.3	小业主与自雇者	871	17.6
集镇	847	17.2	工人	1995	40.5
所有制			阶层认同		
公有	2872	58.2	中产阶层	652	13.2
非公	2064	41.8	劳工阶层	4262	86.3
性别			地方人大选举投票行为		
男性	2327	47.1	参加投票	1237	25.1
女性	2609	52.9	没参加投票	3699	74.9
政治面貌				均值	标准差
党员	568	11.5	年龄	42.9	13.2
非党员	4368	88.5	2005年个人总收入	13927.1	18767.5

六、研究发现

表 2 报告了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是否参加投票的一组二分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型 1 是只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7 是引入了全部预测变量的全模型,模型 2 至 6 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嵌套模型。所有模型的卡方值在相应的自由度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 < 0.001$)。

模型 1 显示,直辖市/省会城市与集镇居民之间,在基层人大选举

中的投票行为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这两类居民参加投票的几率均高于其他两类城市居民($p < 0.01$)。公有制部门就业人员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非公有制部门就业人员参加投票几率的1.44倍($p < 0.001$)。男性参加投票的几率略高于女性,大约是女性的1.11倍,但这一差异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年龄和年龄平方项的效应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 < 0.001$),但年龄平方的效应为负,表明在一定年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投票的几率会增加,而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参加投票的几率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党员身份的效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党员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非党员的1.56倍($p < 0.001$)。这些控制变量对投票行为的效应并非本研究的重点,下文不作更多的讨论。

模型2加入了核心自变量阶层地位,模型卡方值为253.32,自由度为11。与模型1相比,多用了4个自由度,卡方值提高了14.53,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显著性水平 $p < 0.01$ 、自由度为4时,卡方的临界值为13.28)。表明阶层地位对投票行为是一个有效的解释变量,其结果支持了阶层政治论。

模型3用收入替换了阶层地位,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收入。结果显示,收入不仅在未控制阶层地位的情形下能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模型3与模型1相比,多用1个自由度,卡方值增加了8.14, $p < 0.01$)而且,在控制了阶层地位的情形下效应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4与模型2相比,多用1个自由度,卡方值提高了6.17, $p < 0.05$)。

模型5用阶层认同替换了阶层地位,模型6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阶层认同。结果显示,阶层认同在未控制阶层地位的情形下能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模型5与模型1相比,多用1个自由度,卡方值增加了7.26, $p < 0.01$),而在控制了阶层地位的情形下其效应也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6与模型2相比,多用1个自由度,卡方值提高了4.73, $p < 0.05$)。这些结果表明,收入、阶层认同都是投票行为的有效解释变量,是与阶层政治论的理性选择解释、社会心理解释相一致的。

模型2显示,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工人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可能性依次下降。公职新中产参加投票的几率约为工人的1.40倍($p < 0.001$),市场新中产参加投票的几率约为工人的1.26倍($p < 0.05$),而小业主和自雇者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

工人的 1.11 倍。在分别控制了收入(模型 4)、阶层认同(模型 6)和同时控制二者(模型 7)的条件下,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这 3 个虚拟变量对投票行为依然有直接效应(参见表 2)。这些结果支持了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更有可能参加投票的假设(假设 1a)。

研究发现支持了假设 1b。收入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是显著的。比较模型 2 与模型 4 间阶层地位虚拟变量系数的变化,可以发现,收入变量的引进削弱了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和自雇者这 3 个虚拟变量的效应,三者系数分别减小了 0.0158、0.0285 和 0.0098。我们用自助法(Bootstrap)^①所估计的这些系数变化差值的标准误,分别为 0.0070、0.0122 和 0.0062。在 95% 置信水平下的百分位自助法置信区间(Percentile Bootstrap CI)分别为 [0.0018, 0.0307]、[0.0070, 0.0537] 和 [0.0001, 0.0258], 均未包括 0, 即这些系数的减量在 $p < 0.05$ 的显著水平下不为 0。这些发现表明,收入对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阐明作用,是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联的一种解释机制。阶层地位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收入,进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投票行为。

根据模型 7,公职新中产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工人的 1.35 倍($p < 0.01$),市场新中产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工人的 1.19 倍($p < 0.1$)。改变这一模型中阶层地位的参照项,我们得到:公职新中产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市场新中产的 1.13 倍,是小业主和自雇者的 1.25 倍;市场新中产参加投票的几率大约是小业主与自雇者的 1.10 倍。这些发现与中产阶层内部异质性假设是一致的。但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间的这些差异,统计检验均未达到 $p < 0.05$ 的显著性水平。因此,这些研究发现虽不能否定中产阶层内部异质性假设(假设 2a、2b),但也不构成对这些假设的有力支持。

比较模型 2 与模型 6 可以发现,阶层认同变量的引进削减了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 3 个虚拟变量的效应。其系数分别减小了 0.0210、0.0318 和 0.0194。这些系数变化差值的标准误分别为 0.0102、0.0153 和 0.0098,在 95% 置信水平下的百分位自助法置信区间为 [0.0015, 0.0442]、[0.0027, 0.0647] 和 [0.0018, 0.0412]。

^① 有关该方法的介绍,参见 Preacher & Hayes(2004, 2008a, 2008b)。我们的运算使用了 R 统计分析软件,自抽样次数为 500。

表 2 中国城市居民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行为的二分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参加投票 = 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Exp (β)						
城市级别 ^a								
直辖市/省会	-.0705 (.0926)	.9319	-.0781 (.0935)	.9249	-.0984 (.0932)	.9063	-.1011 (.0941)	.9038
地级市	-.8393 *** (.1123)	.4320	-.8265 *** (.1126)	.4376	-.8444 *** (.1124)	.4298	-.8322 *** (.1127)	.4351
县级市	-.3549 ** (.1189)	.7013	-.3471 ** (.1191)	.7067	-.3510 ** (.1190)	.7040	-.3440 ** (.1192)	.7089
公有制 ^b	.3619 *** (.0760)	1.4361	.3205 *** (.0972)	1.3779	.3577 *** (.0762)	1.4301	.3149 ** (.0972)	1.3702
男性 ^c	.1000 (.0688)	1.1052	.1080 (.0691)	1.1141	.0736 (.0694)	1.0764	.0839 (.0698)	1.0875
年龄	.0920 *** (.0183)	1.0963	.0983 *** (.0186)	1.1033	.0941 *** (.0184)	1.0986	.0994 *** (.0187)	1.1045
年龄平方	-.0009 *** (.0002)	.9991						
中共党员 ^d	.4469 *** (.1002)	1.5635	.3423 ** (.1043)	1.4081	.4218 *** (.1006)	1.5248	.3264 ** (.1046)	1.3859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Exp (β)						
阶层 ^a								
公职新中产			.3340 *** (.0942)	1.3965			.3182 *** (.0945)	1.3747
市场新中产			.2329 * (.0939)	1.2623			.2044 * (.0946)	1.2268
小业主与自雇者		.1067	1.1126 (.1238)			.0970	1.1018 (.1238)	
年收入(千元)的自然对数				.0490 **	1.0502 (.0176)	.0439 *	1.0438 (.0176)	
认同中产阶层 ^f								
常数项	-3.4052 *** (.4022)		-3.6618 *** (.4154)		-3.5203 *** (.4057)		-3.7323 *** (.4174)	
模型 χ^2	238.79		253.32		246.93		259.49	
df	8		11		9		12	
p	.000		.000		.000		.000	
n	4914		4914		4914		4914	

续表2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β	Exp (β)	β	Exp (β)	β	Exp (β)
城市级别 ^a						
直辖市/省会	-.0678 (.0927)	.9344	-.0751 (.0936)	.9276	-.0968 (.0942)	.9077
地级市	-.8288*** (.1124)	.4366	-.8193*** (.1127)	.4407	-.8253*** (.1128)	.4381
县级市	-.3360** (.1192)	.7146	-.3325** (.1194)	.7171	-.3311** (.1194)	.7182
公有制 ^b	.3670*** (.0761)	1.4434	.3201*** (.0972)	1.3773	.3150** (.0972)	1.3703
男性 ^c	.0984 (.0688)	1.1034	.1050 (.0691)	1.1108	.0830 (.0698)	1.0866
年龄	.0944*** (.0184)	1.0990	.0996*** (.0187)	1.1048	.1004*** (.0187)	1.1057
年龄平方	-.0009*** (.0002)	.9991	-.0009*** (.0002)	.9991	-.0009*** (.0002)	.9991
中共党员 ^d	.4243*** (.1007)	1.5285	.3309** (.1046)	1.3923	.3173** (.1048)	1.3735

续表 2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β	Exp (β)	β	Exp (β)	β	Exp (β)
阶层 ^e						
公职新中产			.3130 *** (.0948)	1.3675	.3002 ** (.0951)	1.3501
市场新中产			.2011 * (.0951)	1.2228	.1774 # (.0957)	1.1941
小业主与自雇者			.0874 (.1241)	1.0913	.0800 (.1241)	1.0833
年收入 (千元)的自然对数				.0398 *	1.0406 (.0176)	
认同中产阶层 ^f	.2668 ** (.0979)	1.3058	.2185 * (.0994)	1.2442	.1982 * (.0998)	1.2193
常数项	-3.5190 *** (.4051)		-3.7203 *** (.4165)		-3.7795 *** (.4182)	
模型 χ^2		246.05		258.07		263.37
df		9		12		13
p		.000		.000		.000
n		4914		4914		4914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集镇为参照,非公有为参照,^a 女性为参照,^d 非党员为参照,^e 工人为参照,^f 认同劳工阶层为参照。

这些发现支持了假设3。阶层认同是客观阶层地位与对投票行为之间关系的又一阐明变量; 高阶地位的人更有可能认同中产阶级, 而认同中产阶级更有可能参加投票。

进一步比较模型7与模型4, 我们还发现, 在控制了阶层认同的情形下, 收入对投票行为的效应有了显著的削减, 其系数减小了0.0031, 相应的标准误为0.0017, 在95%置信水平下的百分位自助法置信区间为[0.0003, 0.0065]。表明阶层认同阐明了一部分收入对投票行为的效应, 是收入影响投票行为的一个机制。

七、总 结

从基层人大选举中人们参加投票与否这一政治参与行为来看, 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里确实存在着来自不同阶层的政治力量。阶层政治论的观点是适用于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形的。正如泽兰尼等人 (Szelenyi et al., 1997) 在分析东欧转型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主张“找回阶层”那样, 我们认为,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干群关系、劳资关系, 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 阶层分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对反阶层政治论、阶层政治终结论的观点, 我们则持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阶层地位影响人们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行为的两重机制。收入和阶层认同作为两个中间变量, 对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具有阐明作用。阶层地位对投票行为有着直接影响, 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更有可能参加投票, 而这可以由他们的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级来解释。人们的收入越高, 越有可能认同中产阶级; 人们的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级, 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中产阶级投票行为积极、工人阶层投票行为相对消极, 这既取决于他们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又受到阶层地位归属的影响。

我们的这些发现, 整合了强调阶层利益重要性的理性选择解释和强调阶层意识重要性的社会心理解释。经济利益是联系阶层地位与选举这一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机制, 而阶层认同则是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经济利益与投票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因果环节。我们的

理论概括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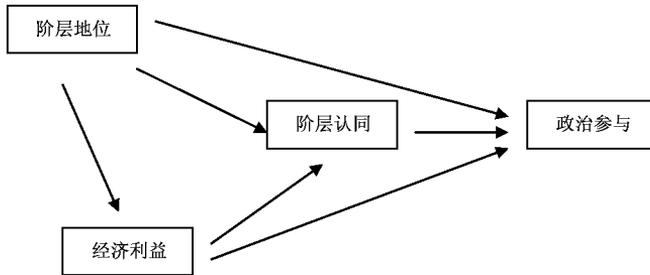


图 1 阶层政治的理论解释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产阶层地位因依赖于权力或市场而可能存在的内部异质性,我们把新中产阶层区分为公职新中产和市场新中产,并推测公职新中产比市场新中产更积极支持现有权威结构。然而,研究发现虽与我们的推测不矛盾,但却未能很好地支持这一假定。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所使用的投票行为指标过分简单所致。未来在研究设计上,应更重视从不同的方面测量中国基层人大选举中的投票行为。

我们把人们在基层人大选举中的参选行为,理解为民众利益表达的方式和对现行权威结构的支持程度。在以往研究中,中国民众在基层人大选举中的行为,或被看作类似于西方政党竞选中的民主参与,或被解读为缺乏自主性的政治仪式。与以往的理解不同,我们认为,参加投票所衡量的是民众通过对现行权威结构的支持来维护或获取自身利益的行为;而没参加投票则可能衡量了民众因现行权威结构无法维护自身利益而与之相疏离的行为。本研究有关中产阶层与工人投票行为差异的发现支持了这种理解。中产阶层在改革中处于优势地位,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失去昔日“老大哥”地位的工人阶层则更有可能没参加投票。

以往不少研究仅重视描绘出不同阶层在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在研究设计上却缺乏中间阐明变量,只是做出猜测性的解释,从而使阶层分析失去应有的理论洞见(刘欣、马磊,2011)。本文在考察不同阶层在基层人大选举中投票行为差异的同时,更重视以经验资料为依据来揭示这种差异形成的机制,为弥补上述缺陷做出了尝试。

然而,由于资料所限,本研究所讨论的投票行为只反映了“参加投票”与“没参加投票”之间的差别,而对参加投票者是投谁的票、主动投票还是被动投票、候选人能否代表选民的利益等,都缺乏直接的测量指标。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史卫民、雷兢璇,1999;史卫民、刘智,2003;史卫民等,2009),虽有理由把参加投票视为投赞同票,但这种间接推断并非直接测量,其效度在未来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改善。此外,由于调查资料缺少对政治效能感的完整测量,以致本文无法比较政治效能感、收入、阶层认同的阐明效应的大小。究竟是政治效能感的解释还是阶层政治论的解释更适合中国的情形,只能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本文试图基于研究发现进一步整合阶层政治的理性选择解释与社会心理解释,将阶层认同看作是阶层地位、经济利益与投票行为之间的一个因果环节。我们也发现阶层意识具有一定阐明效应,但其阐明效应却不是很强。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必要在阶层认同之外进一步寻找阐明变量来拓展新阶层政治论的解释机制。

参考文献:

- 阿尔蒙德·加布里埃尔·A.、拉塞尔·J.多尔顿、小G.宾厄姆·鲍威尔、卡雷·斯特罗姆等,2010,《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方卿、吴新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蔡定剑主编,2002,《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
-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海贝勒,2005,《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以社区为例》,鲁路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 何俊志,2005,《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
- ,2009,《选举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李春玲,2009,《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关注点的变化》,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第2期。
-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培林编,1995,《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普塞特,1995,《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强,2009,《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分析》,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北

-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测量与分析》,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林宗弘、吴晓刚 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 1978 - 2005》,《社会》第 6 期。
- 刘欣 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2005a,《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2005b,《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2009,《新政治社会学: 范式转型抑或理论补充》,《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2010a,《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与阶层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庆 30 周年活动纪念册》。
- 2010b,《公共权力、市场能力与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谢曙光、周晓虹主编《中国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欣、马磊 2011,《中产阶级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 - 2010)》,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 2001,《数据选举: 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卢周来 2005,《回到政治经济学时代》,《读书》第 1 期。
- 陆学艺 2010,《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7 期。
- 陆学艺主编 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尼恩 2010,《中国政治》,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拉塞尔·J. 多尔顿、小 G. 宾厄姆·鲍威尔、卡雷·斯特罗姆等《当代比较政治学: 世界视野》,杨红伟、方卿、吴新叶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沈原 2007,《市场、阶级与社会: 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史卫民、郭巍青、刘智 2009,《中国选举进展报告》,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卫民、雷兢璇 1999,《直接选举: 制度与过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卫民、刘智 2003,《规范选举: 2001 - 2002 年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立平 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2003,《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孙立平、李强、沈原 2004,《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田毅鹏 2007,《“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 期。
- 王俊秀、杨宜音主编 2011,《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继平 2006,《新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的宣传动员——以北京市基层选举为个案研究》,《北京党史》第 2 期。

- 吴敬琏 2009,《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北京日报》5月4日。
- 吴忠民 2006,《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于建嵘 2007,《威权政治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制危机》,《中国与世界观察》第8期。
- 张翼 2008,《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Achterberg, Peter & Dick Houtman 2006, “Why Do So Many People Vote ‘Unnaturally’? A Cultural Explanation for Voting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1).
- Bartle, John 1998, “Left-Right Position Matters, But Does Social Class? Causal Models of the 1992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3).
- Brady, Henry E. 199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John P. Robinson, Phillip R. Shaver & Lawrence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Burawoy, Michael 2000,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Cai, Yongshun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45(5).
- Campbell, Angus, 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Jie & Chunlong Lu 2006,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Towards Urban Self-Govern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1(2).
- Chen, Jie & Zhong Yang 2002,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1).
- Clark, Terry Nichols Seymour Martin Lipset & Michael Rempel 2001, “The Declini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lass.” In Terry Nichols Clark &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A Debate on Post-Industrial Stratification*.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Denny, Kevin & Orla Doyle 2008, “Political Interest, Cognitive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Determinants of Voter Turnout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 Erikson, Robert & John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ulau, Heinz 1955, “Perceptions of Class and Party in Voting Behavior: 1952.”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2).
- Evans, Geoffrey 1993, “The Decline of Class Divisions in Britain? Class and Ideological Preferences i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3).
- Franklin, Mark N. & Anthony Mughan 1978, “The Decline of Class Voting in Britain: Problems of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2).
- He, Junzhi 2010, “Independent Candidates in China’s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 Typology.”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4) .
- Heath, Anthony ,John K. Curtice & Roger Jowell 1985 *How Britain Votes*. London: Pergamon.
- Heath, Anthony & James Tilley 2003,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Values in Britain ,1983 – 1997. " Working Paper No. 102 in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Elections and Social Trends (CREST)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University Oxford. Retrieved from CREST website on March , 6th ,2011(<http://www.crest.ox.ac.uk/papers/p102.pdf>) .
- Hout, Michael & Clem Brooks 1999, "Classes ,Unions and the Realignment of U. S. Presidential Voting ,1952 – 1992. "In Geoffrey Evans (ed.)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Class Vot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ut, Michael ,Clem Brooks & Jeff Manza 2001, "The Persistence of Class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 Terry Nichols Clark &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A Debate on Post-Industrial Stratification*. Washington ,D. 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 Economic ,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Ron J. & Charles J. Pattie 1992, "Class Dealignment and the Regional Polarization of Voting Patterns in Great Britain ,1964 – 1987. " *Political Geography* 11(1) .
- Li ,He 2006,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nd Its Implications. " *Asian Affairs* 33(2) .
- Li ,Lianjiang 2002, "The Politics of Introducing Direct Township Elections in China. "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 Lipset, Seymour Martin & Stein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Paul F. Lazarsfeld ,Allen H. Barton & Juan Linz 1954, "The Psychology of Voti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Gardner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 Vol. II.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Manza, Jeff, Michael Hout & Clem Brooks 1995, "Class Voting in Capitalist Democracies Since World War II: Dealignment , Realignment or Trendless Fluctu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 Offe ,Claus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 *Social Research* 52.
-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andy ,Kenneth 2000, "Class , the Stratification Order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2) .
- Preacher ,Kristopher & Andrew F. Hayes 2004,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 Instruments , and Computers* 36.
- 2008a,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Mediation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A.

- F. Hayes, M. D. Slater & L. B. Snyder (eds.) *The Sage Sourcebook of Advanced Data Analysis Method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 CA: Sage.
- 2008b,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3) .
- Shi , Tianjian 1999,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1(4) .
- Szelenyi , Ivan , Eva Fodor & Eric Hanley 1997, “Left Turn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Bringing Class Back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1) .
- Szelenyi , Szonja , Ivan Szelenyi & Winifred R. Poster 1996, “Interests and Symbols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Culture: The Case of Hunga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Tang , Min , D. Woods & Jujun Zhao 2009, “Th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towards Democra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
- Van der Waal , Jeroen , Peter Achterberg & Dick Houtman 2007, “Class Is Not Dead-It has Been Buried Alive: Class Voting and Cultural Voting in Postwar Western Societies (1956 – 1990) . ” *Politics Society* 35.
- Weakliem , David L. & Anthony Heath 1994, “Rational Choice and Class Voting.”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2) .
- Weeden , Kim A. 2002, “Review of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3) .
- Whiteley , Paul 1986, “Predicting the Labour Vote in 1983: Social Backgrounds Versus Subjective Evalu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34(1) .
- Womack , Brantly 1982, “The 1980 County-Level Elections in China: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Modernization.” *Asian Survey* 22(3)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宛丽

PAPER

Opportunity Structures , Horizontal Networks and Frame Resonances in Egyptian Social Movements *Zhou Ming & Zeng Xianghong* 1

Abstract: This paper stems from a puzzle: why the two large-scale social movements in Egypt in 2005 and 2011 (namely the “Enough” movement and the “January 25th” movement) that aiming at bringing the Mubarak regime down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Usi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these two social movements faced similar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mobilized the same horizontal social networks; however , the frames appeared in these social movements had produced different frame resonances. Thereby , these differences influenced their respective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 which led to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ocial Class and Local Congressional Election in Urban China
..... *Liu Xin & Zhu Yan* 34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literature emphasiz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understanding voting behavior in China’s local congressional election , the authors propose to explain voting behavior from the logic of class politics.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lass politics argues that class position influences voting through class interest , while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class politic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s a mediator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both explanations are well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06 , calculat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test of coefficient difference across regression models. Compared to working class , the middle classes , old or new ,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This is further ex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enjoy higher income and stronger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as middle class. The higher income also leads to stronger middle class identification , thus stronger inclination to vote. Integrating the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 the authors extend the explanation of class politics and conclude that class interest not only functions as the mediation linking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but also explic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s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through class 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lass politics offers an appropriate logic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udicial Spanning of Legal Structural Holes: Social network analyses of closely related groups' legal management *Zhang Hongtao* 59

Abstract: When judges (laws) face villagers and its closely related groups ,there is no structural hole among villagers whil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do exist on the side of judges or laws , which puts judges (laws) at disadvantage in the network.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legal structural holes , judges (laws) have the village heads ,customary laws and mediation embedded into dispute resolution tactics to change their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and improve structural autonomy by filling up th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When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law are stranger groups , judges (laws) can improve structure autonomy by using the structural holes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But even then judges (laws) are not in the best position ,wher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are not around them ,but on the side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law. Hence the most urgent task for China's rule of law i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articular Chinese factors and enacted laws ,so as to fill up th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increase judges' structural autonomy and make laws more appropriate for closely related groups or stranger groups.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y under Expanded Clinical Perspective: Targeting new employees of Factory D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 Guanghuai & Liu Yan* 83

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on of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as the bridg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expanded clinical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Balgopal a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of Factory D in Guangdong province ,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new employee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person and the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al work profession when social workers practiced in the world of work and argues that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or new employees can reduce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employees and will bring a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 China.

The State ,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